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264.4

辽宁人民出版社

K264.4

5

5275 15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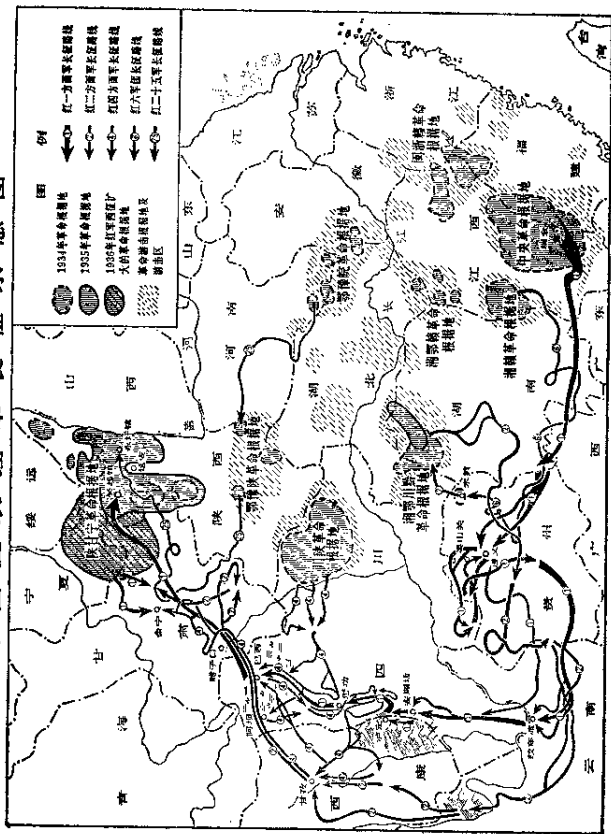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沈阳

A428138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示意图



毛主席语录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目 录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1)

回顾长征刘伯承 (6)

资 料:

伟大的长征 (24)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示意图 (28)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年十月，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至此，三支主力红军先后结束了战略大转移，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代一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

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个英明的论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三一年，由于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才保存和锻炼了红军的骨干，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胜利结束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回顾长征的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不论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向前发展；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先“左”后右，最后叛国投敌，当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南下逃跑，最后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可耻的叛徒。刘少奇、林彪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这就告诉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就要反对投降派。

长征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材。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现在还是这两个可能。今后五十年或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通过学习和批判，使全国人民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这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可靠保证。

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明搞宗派，“以我为核心”；张国焘恃仗人多枪多，另立中央。他们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不得人心，不可能不垮台。毛主席提倡要搞“五湖四

海”，不管是那个山头、那个方面军的，不管是北方、南方的，都要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团结起来。正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了各路红军，长征才以敌人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团结战斗的光荣传统，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促进安定团结。

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英雄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现在，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之红军长征时候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能丢。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在长征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向继续战斗在各条战线的老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当前，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打仗而努力奋斗。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回 顾 长 征

刘 伯 承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

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

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

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

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

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鲮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